



十八集

Xuelin Manlu

學林漫

王亮
王培军
何龄休
陈允吉
辛德勇

王国维先生的藏书和遗文
钱锺书与吕思勉
贺云瞿先生琐忆
追怀陈子展先生
释「白垩」

中华书局



十八集

Xuelin Mantu

學
子
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林漫录. 十八集 /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. —北京 :
中华书局, 2011.11

ISBN 978 - 7 - 101 - 08153 - 4

I. 学… II. 中… III. 杂著 - 中国 - 现代 - 选
集 IV. Z429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69930 号

书 名 学林漫录 十八集

编 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

责任编辑 俞国林 李天飞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640 × 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2¼ 插页 2 字数 152 千字

印 数 1-25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8153 - 4

定 价 28.00 元

目 录

王国维先生的藏书和遗文	王 亮/ 1
三世云烟翰墨香 百年丘壑腹笥藏	
——江氏文学山房创设百十周年纪念	李 军/ 17
钱锺书与吕思勉	王培军/ 37
记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	曹旅宁/ 50
我的写字生活(续)	费新我/ 69
贺云瞿先生琐忆	何龄修/ 85
追怀陈子展先生	陈允吉/ 94
《论语》“吾执御矣”解	周国正/100
释“白田”	辛德勇/109
魏收在济南	罗 新/114
孙邨籍贯考	郁震宏/124
宋诗僧道潜生平考略	孔凡礼/127
略论张澍与武威李氏三世学风	雒江生/183
读《人海沧桑》	朱 铭/192

王国维先生的藏书和遗文

■ 王 亮

古今学者无不与书册结侣。世人每称先曾祖王国维先生学术博大,几若无涯岸之可望、辙迹之可寻,其实他生前藏书资料存世尚多,一旦厘清原委始末,足以揭示思想、旨趣、行实的伏脉潜流,为知人论学之助。以下试据亲长见告者及本人积年调查所得,拉杂陈述静安先生一生藏书的状况和归宿,时代既已悬远,其间或有纰谬失察,尚祈方家匡旃。

一、藏书始末与归宿

静安先生出身地浙江海宁,素称文物郁郁之乡,但据《〈敬业堂文集〉书后》自述,太平天国战事后,创痍未瘳,家道中落,“自能知书以迄弱冠,居乡之日,未尝见一旧本书、一金石刻,盖三百年来文献尽矣”,仅“家有书五六篋”而已。其实当时海宁士绅藏书仍有蔚然成家者,如张渭渔的小清仪阁,静安先生是在二十九岁返乡闲居时才得以过目所藏图书金石。后来静安先生追随罗雪堂,观摩逮于殊方,交游及于天下,先后经眼上虞罗氏、上海哈园、吴兴蒋氏、清廷内府之书,尽窥诸家高编大册、秘笈逸编,治版本目录卓有成就,伦明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谓之“手中何限名山藏,眼底无涯沧海观”。他虽于书籍有夙好,为琉璃厂常客,但财力并不充裕。有一类珍罕的书,如唐写本《切韵》残帙、王念孙《方言疏证补》残稿、《录鬼簿》明抄本,就手抄自存,再以他本校正,更

多情况是以自藏通行本参校获见善本，每每重勘数次，足成学术意义上的“善本”。如《藏书目》，《尊前集》万历顾梧芳刻本较近世稀见，罗氏唐风楼中有朱彝尊曝书亭旧藏本半部，遂钞一过，又以汲古阁刻《词苑英华》本补阙卷。友朋如缪荃孙也曾转录清尤贞起钞本《录鬼簿》相赠。静安先生中年以后留心金石学，篋中所存友朋赠与拓本零叶尤多。

静安先生居沪、居京时，往还较多的书肆、书估、古玩商分别有蟬隐庐、柳蓉村、古书流通处、金颂清、程冰泉、富晋斋、文友堂等。

刘蕙孙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他自日本回国，罗振玉先生“将大云书库所藏副本三万馀卷全数借赠”，这个数字未尽可靠。据《丙辰日记》稿本，赴沪时有书箱十箱，并记“此次临行购得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戴氏遗书》残本，复从韞公（罗振玉）乞得复本书若干部，而以词曲书赠韞公”，可知自罗氏所得去三万卷之数颇远。

弟子姚名达在《友坐私语》中说“返观身后所遗藏书，则寥寥万卷，无以异人，古物尤不数数觐。后之学者，可以省矣”，可知他所蓄惟期有裨治学，不以弄藏善本书名世。清末任职学部期间，先生收得戏曲善本较多。如明宣德本《周宪王杂剧》、嘉靖本《雍熙乐府》、崇祯本《盛明杂剧初集》。董康诵芬室1918年刊《盛明杂剧初集》，即借用作底本。一度有传闻董康将此书私下高价让售他氏，静安先生致罗雪堂书信中曾述及，董氏力辩无其事，据《大云书库藏书目录》，此书后归雪堂所有，今在辽宁大连图书馆。1916年岁末先生居海上时，于蟬隐庐书肆以价银5元得孙诒让《契文举例》稿本，曾付影印；又曾得清严元照手稿零篇多种。他为湖州藏书家蒋汝藻编藏书目，蒋氏曾赠以宋本残页。《传书堂善本书志》稿本（今藏北图）中有失题跋语一则，谓“宋刊九行本三史，余所见有归安刘氏、南海潘氏《史记》二本。此本行款既与《史记》略同，当是同时所刊。《史记》既为两淮刊本，则此当是江

东漕司刊本矣。南林蒋氏藏明钞《成祖实录》，其封面以此页作衬纸，因乞得，装为立轴，因记其”（以下阙）。此残页为南宋两淮、江东转运司刊本《后汉书》，附跋原迹今藏上海图书馆。

静安先生辞世之际，有遗嘱“书籍可托陈（寅恪）、吴（宓）二先生处理”，据现居台北的姑婆王东明（曾祖长女）回忆，1928年家眷南归海宁，藏书之大宗经清华国学院同事陈寅恪、吴宓、赵元任诸先生商议，让售北平北海图书馆，馆方给价五千元。同年《北海图书馆月刊》二卷三、四号载馆讯说“海宁王先生之歿，为学术界重大损失，其藏书虽不多，但生平遇有善本，必移录其佳处或异同，间有发明，则别作识语，此项手批手校之书，共有一百九十余种，约七百餘册，本馆为保存先哲手泽起见，特全部购入，以垂久远”。批校本既为静安先生一生精力所倾注，其学术价值自然为藏书中之白眉。治专门之学者如顾廷龙先生等均曾择要过录。可惜经整理刊行者仅《水经注校》等寥寥数种。赵万里先生整理遗书，检出历年手校手批各书凡一百五十五种，草成《王观堂先生校本批本书目》，1927年10月发表于《国学月报》第28卷第10期。稍后又检出三十多种，都一百九十二种，编为《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》，刊于次年出版的《国学论丛》一卷三号。抗战时期部分北平图书馆善本迁运美国，其中也有静安先生批校之本（如明正德十年苏州刊本《大唐六典》三十卷，乃宣统庚戌得于京师，《庚辛之间读书记》列为首篇者，从最末的题跋可知直迄民国十年仍以残宋本再校），后来寄存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，又转入台北故宫博物院。1967年王德毅先生在台北著成《王国维年谱》，以赵编为蓝本，附录《王观堂先生校勘书目》一百八十四种。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曾辑录七十种，刊载于1981年《文献》第3、4期。时下文献信息远较数十年前富足，可补苴的品种为数不少。如赵先生附记说“先生于词曲各书，亦多有校勘。如《元曲选》则校以《雍熙乐府》，《乐章集》则校以宋槧，因原书早归上虞罗氏，今多不知流

归何氏,未见原书,故未收入,至为憾也”。附记所指涉的,大致就是《静安藏书目》著录的词曲书。赵撰《王静安先生年谱》丙辰年(1916)四十岁条下“罗(振玉)先生又贻以复本书若干种,先生亦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”。所以《罗氏藏书目》(《罗雪堂合集》题作《大云书库藏书目》,《王国维全集》题作《罗振玉藏书目录》,编成年月二本均定为赴日之初,其实依据著录书籍内容,可知此本已经罗氏增订,已非严格意义上的观堂著述)集部词曲类一度著录。其中25种现藏于东洋文库,有“罗振常读书记”之印,于昭和三年(1928)7月经文求堂归东洋文库,日本的榎一雄先生曾于1977年3月在《东洋文库书报》第8号上作介绍。相关的背景,是静安先生逝世后,罗振玉委托其弟罗振常售出观堂旧藏以接济家属,故友、后学若内藤湖南、狩野直喜、铃木虎雄、久保得二、神田喜一郎、仓石武四郎、吉川幸次郎等均曾获致。如大谷大学藏明末朱墨套印本《西厢记》第四册有内藤湖南识语:“丁卯六月,王忠愍公自沉殉节,沪上蟬隐主人售其旧藏以充恤孤之资。予因购获此书,永为纪念。九月由沪上到。炳卿。”这批书籍后来仍有未售者留存罗家。如《静安藏书目》著录的汲古阁《津逮秘书》本《冷斋夜话》,静安先生后来在日本,经董康手又获致日本五山版覆宋版五卷残本,据以对校并有识语,罗振玉据此王校之本排印,收入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,校本在罗家庋藏数十年,罗继祖先生身故后散出,近年为京津某藏书家购得。五山版《冷斋夜话》后来仍归董康,1914年傅增湘曾借校于自藏《稗海》本上,今藏何地已不可知。近年现身的《曲录》稿本,也出自罗振常后人家中。不过据周一平先生记述的周子美先生回忆,他的岳丈罗振常曾将手头的若干书籍盖上王国维图章售出,罗氏经营书肆多历年所,这些书籍的散布范围也就相当广泛了。至于1928年神田喜一郎所得、今藏大谷大学的自批蒋刊本《观堂集林》,则是由静安先生第三子、笔者的叔公王贞明直接让售,与罗氏无涉。

抗战结束之后,任职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自笔者曾祖母潘老夫人、祖父王仲闻处取走若干遗稿交北平图书馆,当时赵先生操办此事甚为隐秘,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也是事后才获知。一九五〇年代初,祖父将家藏静安先生遗稿、信札捐送北京图书馆,经手人为赵万里先生,少数留存者在“文革”中遗失。至此,曾祖藏书和遗稿大体已汇归北图。在台湾,东明姑婆和庆襄堂伯(三叔公王贞明之子)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向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捐送了所保存的静安先生手迹、遗物十四件和罗振玉所治的一枚印章,包括印入《王国维遗书》卷首的附手跋段懋堂(玉裁)墨迹,其中一半为附跋拓本,如宋巨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、汉南吕编磬拓本、唐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图拓本、伯吉父盘拓本等。宣统甲子(1924)元旦试笔诗一首,是各种诗文集和年谱中失收的。而他最后所任教的清华大学,现在确知并无遗留书籍收藏。

民国时期的学者已注意收集与静安先生有关的各种文献。王欣夫先生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庚辛稿卷一《古文尚书孔氏传不分卷》篇述及“昔年沪上哈同花园拆除旧屋,有人扫得残纸一束,为邻近秀州书店所收。友人偶过,得钞本王国维所著《唐韵残本校勘记》,已嫁名睢宁姬觉弥,为备刊之底本。余见而亟得物色,得此及臧庸所辑《汉书音义》两钞本。盖当时静安讲授于仓圣明智大学,为刊《学术丛编诸书》,此其所储资料也”。

静安先生一生既屡经转徙,旧藏散处大陆、台湾、日本,为私人所有未公示者为数当仍不少。经他题款的精槧名钞,不计金石零拓之本,合计也在二百种以上。除前述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外,他若北京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博物馆、哈佛燕京图书馆,若南开大学图书馆,若笔者供职的复旦图书馆,都有静安先生藏书和批校本的影踪。

赵万里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撰稿,凡王国维先生的重要著作都一一作了解题,后来经冀淑英整

理刊载在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》(第一辑中的《静安先生遗著选跋》即为其中一部分),不过并未将《静安藏书目》和《传书堂善本书志》列入。赵先生为曾祖編集,也偶有将手录他人文字视为自作误录的情形。

一般而言,对前人的学术思想作切实的观察和研究,著述、书札、日记、藏书可视为四把通启户牖的“管钥”,藏书每每被有意无意忽略,则与搜辑原始资料的种种困难有关:学者本人未必编书目、记书账;早期与晚年的藏书内容会有持续变化;是否钤章、作题跋,各人未必有定则。而甄别伪作,尤非易易。比来文物拍卖兴起,一再有热心的私人藏家告知静安先生藏书现世的讯息,各地书影图录中也屡屡发见线索。目前,筹办中的海宁王国维书院(陈列馆)正着手访求蒐集。不过市价既已高企,随之也有伪迹、伪本出现。静安先生一生书法得力于《多宝塔碑》,行、楷而外,不习他体。日本有藏家收得甲骨文书联相询,而静安先生一生未尝以篆隶题字,又有据称出自北美张充和旧藏的赵之谦体魏碑联,亦非真迹。数年前津门有书坊老辈示以《捃古录》校跋等数种,目验方知实系赵万里先生过录之本。孟宪钧先生并告知笔者,他所见及的扇面贗品不止一例,印章颇精,作伪者为数十年前的天津人氏。

二、《静安藏书目》与早期思想

观堂先生三十岁以前藏书的情形,在自撰《静安藏书目》中能见出概貌。这里说到的《藏书目》,其实是《人间词话》手稿本的一个附录,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。原件与《人间词话》合订一册,同为毛边蓝格直行笺纸,半叶十行,版心镌“光绪□年□月□日”暨“养正书塾札记簿”字样,卷首自署“静安藏书目”五字,末页记“张砺若”姓名地址(张氏行实待考)。养正书塾在杭州,此札记

簿经刘烜等学者考证,原属先曾叔公王国华(1887—1980,静安先生胞弟)所有。《人间词话》稿本写就于光绪三十二至三十四年(1906—1908)间,因此《藏书目》的撰作也可以确认大致在此时段内。全《目》均出静安先生手,并有增补改易处,共著录一百七十部自藏书(包括丛书)。《人间词话》稿本已数度影印,但均不是完整原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的影印本,首度向学界揭示了《藏书目》,不过印数极少,似乎迄未引起研究者注意。

就体例来看,《藏书目》著录颇简略,大致按四库分类法编次,首列江西局本《十三经注疏》,仅记书名、册数,间或注出版本、作者。非通行本者才特为注出版本,计28种。如《湛甘泉集》注“原刻”,《剑南诗稿》注“汲古阁本初印”,《尊前集》注“影钞万历顾梧芳刻本”,《浣梦词》注“刘彦翁手抄本”,《传奇汇考》十册注“精钞本”,《雍熙乐府》廿一册注“嘉靖楚藩刻本”。核以今日可明确藏地的若干原本,可知《藏书目》中著录的抄本,多为静安先生自抄。

《藏书目》所记以通行本为主,以词集和剧曲为大宗,其中词集(总集、别集)42种,戏曲类24种,古代重要作家的文集基本齐备,与他当时研究的侧重也是相符的(斯时静安先生自名京师宣内居所为“学学山海居”,戏拟收藏戏曲的前贤李开先、黄丕烈)。他辑录唐五代二十一家词,纂辑《词录》、《曲录》二专题目录,大致也在同时。在一定程度上,《藏书目》可以作为《人间词话》的参考书目来读。譬如《词话》论“双声叠韵”,说“吾乡周公霭先生著《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》,正千馀年之误,可谓有功臣苑者矣”,而《藏书目》中即有《杜诗双声叠韵谱》一部四本。值得注意的是目中理学家著作16种,包括《二程全书》、《杨文靖集》、《朱子大全集》、《朱子语类》、《四书语类》、《陆象山全集》、《薛文清公读书录》、《王文成公全集》、《湛甘泉集》、《陆清献公全集》、《李二曲全集》、《近思录》、《朱子年谱》、《性理会通》、《正谊堂全书》。《静安文集》中有《论性》、《释理》二早年名篇,其中国哲学方面的主

要参考书很可能就是这些著作。《人间词话删稿》第四三则中对龚自珍有如下评语：

龚定庵诗云：‘偶赋凌云偶倦飞，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，便说寻春为汝归。’其人之凉薄无行，跃然纸墨间。（龚氏原诗为《己亥杂诗》三百十五首之一）

如此这般呵责“儇薄语”，今天的读者不易索解。《藏书目》中有《龚定庵全集》六本，可知静安先生对龚氏的诗文是熟悉的。参照这个书目，也许可以见出静安先生早年熏习性理之学、重视立诚修身的程度甚深，超出我们以往所知，而此一以贯之的道德上的“洁癖”，很可能与宋代王氏先人忠义传家的家史有关（王稟据守太原抗金，入《宋史·忠义传》，参见《观堂集林》卷二三《补家谱忠壮公传》），此种传统士大夫情怀，影响及于其文学观念和对文人的臧否。梁任公手跋龚定庵自书诗卷有“少年深喜定庵诗，过半成诵，后渐厌之”（大意）的话，静安先生对龚氏的体认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番的纡折，不敢言必，兹拈出以就教于高明。他与吴昌绶在词学上互为师友，吴氏好龚氏词文，光绪三十四年前后并撰成定庵年谱，此则文字可能是对吴氏一再揄扬龚自珍的回应。而仅存于《词话》手稿，未在《国粹学报》正式发表，可能自觉用语太过，也可能见解有所变化。这其中的主因，恐怕还是“性分相戾”。晚年批校《藏书纪事诗》，对于顾千里、黄丕烈的褒贬不同，缘于顾氏“善骂人”，不如黄氏“坦率”，取则大致相同。在学术统系上，龚自珍属今文学派，静安先生虽不以家数自限，宗旨仍与古文学派相近。后来作《殷墟书契考释后序》，有“俗儒鄙夫，不通字例，未习旧艺者，遂乃肆其私臆，无所忌惮，至庄葆琛、龚定庵、陈颂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极矣”；《二牖轩随录》中“近世金文之书最著者”条称“（吴荣光）《筠清（馆金文）》则出于龚定庵自珍，……惟《筠清》释文，最为诞妄”，学术上的评价就更低了。

《藏书目》中未列入新学、西学书。也许静安先生有意识地按

传统书目体制加以甄择去取,而并非斯时一无收藏(是时客居北京,为学部总务司行走,历充图书编译局编译、名词馆协修,译述夥夥)。《藏书目》可视为一种行篋书目,虽不能揭示他当时收藏的全部,但足以窥知其一阶段的治学旨趣和心力所趋。比照二年后的《庚辛之间读书记》15种题跋,多为此目著录之书,可知《读书记》所记皆自藏本,经前后数年细读,故多心得之语。

近来有学者欲探究静安先生早年所凭藉的“思想资源”与日本人著述的关系,曾辗转询及他早年收藏日人著作的下落。可惜他的大宗藏书迭次归入北图时并未设立专藏,其中纵然有普通平装本,今人无从辨识,不免有追踪人迹至于桑驼海,于此路穷之叹。北京图书馆馆旧档存世尚多,倘有该馆执业者从中爬梳,或仍有线索可寻。

2007年的《中国学研究》第10辑和2008年7月20日上海《新民晚报》有学者撰文,认为观堂先生覃精佛学,《人间词话》、《人间词》的得名来自佛教语汇,“人间”两字应视作是佛教六道之一的“人道”来解。取照《藏书目》,其中仅有佛教书三种:《一切经音义》、《象教皮言》、《因明琐记》。其中《一切经音义》严格说来属文字音韵训诂门类(前后所藏所校不止一本,今藏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各一部)。《因明琐记》作者不详,内容当为佛教逻辑,很可能是作为研治西方哲学的参考书。最后一种《象教皮言》,即明人陈士元编《象教皮编》六卷,分类汇辑释家语,内容较浅显。此外别无一部“正宗”佛家典籍。他撰吴兴蒋氏密韵楼书提要,释家类较诸其他部类更形简略。再参证以全集中的著述、诗文,引用和考论佛学的内容寥寥无几。其中比较特出的是写成于光绪戊戌、庚子间的《咏史》二十首第十一首“慧光东照日炎炎,河陇降王正款边。不是金人先入汉,永平谁证梦中缘”,可知他对于中西文化交流、边陲地理的浓厚兴趣发于早年。静安先生中年以后又曾用力于与敦煌学、西北史地相关的佛学目

录学和释书中的史传部分,这类研究与接受佛教思想在性质上截然不同,他思想中与佛学义理近似的部分,更可能来自熟悉印度哲学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。蔡元培 1923 年 5 月 1 日日记载“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,彼言素未研究,询以是否取孔学,彼说大体如此”,可为辅证。

李一氓曾收藏有“王静安手录《词曲书目》”,计 9 页,为 1955 年秋阿英检赠。用“唐风楼校写”钞稿纸(“唐风楼”为罗振玉早年在上海首用之斋馆别号)，“不知书为王藏目,或罗振玉藏目”。李氏书身后多归诸公藏。此本今在何处,待考。李跋述及影写元鏊《中原音韵》,为《藏书目》所未列;又述及《花间集》仅有明仿绍兴本,似为《藏书目》中《花间集》二种之一(参见《一氓题跋》“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”条)。此本显系写录自藏,写录的时间在《静安藏书目》之前或之后,未见原本,目前也不可知。

三、关于广州遗嘱复本

2004 年 11 月间,南方《广州日报》等报刊先后以“国学大师王国维遗嘱 77 年后现身揭自杀之谜”、“投湖遗嘱竟不湿 王国维遗嘱现身广州博物馆”为题,报道广州博物馆收藏并首次展示先曾祖王国维“遗嘱”的消息。记者引用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的介绍说:遗书一直由已故中山大学著名学者容庚收藏,1994 年 8 月,容庚家属将遗嘱连同 100 多件国宝级商周时期青铜器一并捐献给广州博物馆。程馆长并称:“看过遗书的人屈指可数,估计只有他本人和家属、容庚、陈寅恪、吴宓、罗振玉等,之后的 77 年它没有再出现过。”以上消息经国内各报纸和网络媒体纷纷转载,传布颇广,收藏“王国维遗嘱”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此有所回应。李小文于 2004 年 12 月 9 日在《光明日报》撰文说,遗嘱原件一直珍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库中。“这份被昆明湖水浸染过

的遗墨绝笔,毛笔手书,字迹清晰。由于湖水的浸染,可看到染在另一边依稀模糊的反字,还可见入封时的迭痕”,并附有罗振玉题款。2005年9月,台北李敖赴京访问国家图书馆善本部,国图展示的藏品中就列入了“王国维遗嘱”,实有藉此以正视听的用意,但馆方也不明广州藏本就里,始终没有直接评述。

“遗嘱”真伪问题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。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解释说,现在尚无人考证真伪,但该馆收藏的这一份绝对是真的。对于两份“遗嘱”并存,他提出“一些网站上的北京版本的图片有罗振玉的题款,但根据记载,王国维从自沉到办理丧事,罗振玉都不在场,而容庚却一直在现场。1935年,容庚亲自把王国维和罗振玉的书信包括这份遗嘱进行了精心的装裱”。程存洁还推断,“不排除北京收藏的是复制版。有可能是王国维去世后,罗振玉自己或者组织人手复制了一份上呈废帝溥仪,以便给王国维邀求谥号”。至于罗振玉为什么不直接把原版交给溥仪?为什么要多抄一份?程存洁说,这又是一个谜团。

静安先生去世时家人俱在,“遗嘱”交付家事,容庚只是群弟子之一,原件断无由他私藏之理;而北图藏本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先祖父王高明(仲闻)庋藏多年,与一百余件王国维遗墨真迹一并捐予北图的,经手人是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,流传有绪。捐献一事,赵先生还承担了相当的风险。此后不久的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高潮时期,因有若干暂存案头手续未备,被馆内群众追查,赵先生还做过检讨。先祖父不久也受到多次运动的冲击,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,留作纪念的少数图书文籍大多散失。所以赵先生在建国初期建议将王国维遗存归于公藏,确实对保存静安先生的学术遗产有特出功绩。

容庚(1894—1983)先生以研究吉金文字名家,又精深艺事,生前撰有《颂斋书画小记》,以簿录体例详记所藏历代及当世名家翰墨书画,广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影印手稿本。其“王国

维”条下，著录所藏王氏尺牍册十通十二纸，并记：“（尺牍册）末附王先生“遗嘱”一纸，石印本，与罗振玉先生尺牍合装一册。”广州藏本既出于容庚家藏，当即为此“石印本”无疑。容氏郑重记载此“石印本”，也可证实他的藏品中并无原件。据此条下容庚先生1961年1月3日自附小注，容先生确为当时最早前往颐和园自沉地点的人士之一：“……次日辰[晨]其家人来觅，答以未见。旋即有人奔报王先生蹈湖死矣。余奔往颐和园鱼藻轩拜哭之。尸卧于地，盖以草席，轩中虚无一人，其家人尚未至也。余挽以联曰……”，以上记述，可与容先生早年追悼文章相印证，均未提及获藏“遗嘱”原件。

先曾祖“遗嘱”曾付石印一事，未见文字记载，广州藏本很可能出自1927罗氏貽安堂铅印本《王忠愍公哀挽录》中附入之件（另附海外追悼录一卷，华侨哀挽录一卷，补遗一卷，续补一卷），王氏后人、王门弟子为纪念亲师、留存手泽，每本均夹订附入一石印原大遗嘱，天壤间所存尚多。即如杨鍾羲撰文王国维清华旧墓墓志铭，原碑不存，也有拓本流传于世，北平北海图书馆民国十八年即已入藏。据黄永年先生见告，八十年代初曾于中国书店购得数本。

广州博物馆主事者崇仰先贤、宣传馆藏的热忱可钦可佩，惜乎相关考订未能周浹，令世人有“荆轲不习剑”之憾。毕竟学术进步，要以学术积累和学术规范为前提。笔者曾于2006年初就此复本问题在网络上和复旦校刊撰写专文，但流布不广，而媒体炒作效力惊人，各大网站充斥着对广州藏本的报道及转载，负面影响可能历时多年无法消泯。误解的发生，或许在于“容庚的装裱功夫十分了得”（程馆长原话），而此件又与罗、王亲笔书札合订，遂于不经意间为学界平添一新掌故。容庚先生身后，遗藏多捐赠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州博物馆。其《颂斋书画小记》，虽名为“小记”，实为多册巨著，所录存近现代学人事迹小传，尤为珍贵。如

胡厚宣先生考证胡义赞(石查)先生事迹,专门致函咨询,容庚先生即据《小记》中胡义赞小传作答(参见胡厚宣《关于胡石查提早辨认甲骨文的问题》)。《小记》中辑存的诸家文翰题跋均系容先生亲笔过录,藏品今日具在,且集中公藏,完全可以摄制图录,合璧成书。相信随着中国图书馆与博物馆事业的进步与规范,容先生以数十年之力搜罗保存的丰富文献及文物,定能遂其初志,获得规范的整理与阐扬,为岭南学术增添新的荣光。

四、遗文辑集与刊行

静安先生的著作,陈寅恪先生称为“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”(《遗书》序)。先后结集的情况大致如下:

诗词方面,1905年9月刊布《静安诗稿》一卷,《静庵文集》出版后附入,增补为古今体诗五十首。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4月,集数年间所填词成《人间词甲稿》刊,次年又刊布《人间词乙稿》。先生对于早年词作珍爱不置,至中年以后,还先后抄为《苕华词》、《履霜词》赠示友人。民国二年在日本有诗集《壬癸集》,日本京都圣华房以江州旧木活字皮纸印行,印制精雅而存本不多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特予著录。陈鸿祥先生在传记中说初有日本江州旧活字本,后有日本京都圣华山房聚珍本,实际上仅印一次,并无二本。在观堂诗词的注释和解读方面,萧艾《王国维诗词笺校》(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)功力深厚,虽有过于简略之病,诸继起注家仍未能逾越。要做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“钻味既深、神理相接”,尚有待更多努力。

静安先生早年文章和单种著作,多刊载于《教育世界》杂志和罗振玉所刊布的几种丛书中。自日本流亡归来后数年所撰,则多刊载于《广仓学窘丛书》。《教育世界》所刊载的文章以匿名编译为主,迄今作者归属还未有确论。《红楼梦评论》始载1905年版